

民族精神的内在觉醒：我们何以需要中国精神

左亚文 常晨晨

摘要：自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在外部挑战和内部变局的双重冲击下，其精神经历了一个通过自身反思而曲折向前行进的过程。在当今中国的历史变革中，我们重提“中国精神”，乃是中华民族精神自我演进的规律使然。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当改革进入到一定阶段特别是抵达核心领域时，在观念革新中的精神重建本身成为改革的任务和目的，于是，思想的嬗变和觉醒与精神的回归和重建在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真正内在统一起来。从思想精神的解放开始，最终归于精神自身的构建，这是一条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之路，也是一个社会改革和建设所必经的时代逻辑。

关键词：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精神反思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句读经典’与研究生理论素养的提升”（项目编号：2014WT031）；武汉大学党的十九大理论创新专项课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时代意义”（项目编号：2018WT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实现中西马对话和融通的内在机理及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7WT036）

中图分类号：B0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2-0046-07

据说在古希腊德尔斐的神庙上，镌刻着这样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后来，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将其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神圣使命。也许有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为了解的。其实，正如一些哲人所说的，“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①，“对于人最初的和最近的东西乃是最后的和最远的东西”^②，“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对人来说，可能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个民族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其思想意识、精神文化、发展状况其实缺乏自我认知。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民族之一，但是，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甚至直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对自己就缺乏正确的认知。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前后的林则徐作为开明派人士，组织翻译了《四洲志》和《海国图志》，才让更多中国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英、法、美等

其他国家。在这之前，清朝的满朝文武包括道光皇帝在内，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几近浅薄。只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遭受惨败之后，才促使中国的仁人志士痛定思痛，开始进行沉痛的自我反思，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在这种自我反思中逐渐得以觉醒。

一、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反思的三个阶段

对于精神的自我反思，黑格尔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把反思按照其认识的进程区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外在的反思，即对事物外在表象形态的一种认识。黑格尔指出，这种表象的认知“固然处处都以矛盾为自己的内容，可是它不能意识到矛盾；它始终是外在的反思，外在的反思是从相同转到不相同，或者从否定的关系转到各种有差别的规定的内部的反思性。外在的反思从外部使这两种规定相互对立，它所注意的只是这两种规定，而不是它们的

转化，但转化却是本质的东西，本身就包含着矛盾”^③。这就是说，外在的反思虽然以矛盾着的事物为研究对象，但却意识不到这种矛盾。它遵循A=A的形式逻辑，将同一与差异对立起来，甚至视矛盾为非法。当然，这种认知若向前进展，可以转化为“思维的理性”或“理性的思维”。

其次是机智的反思，即开始认识到事物内在矛盾的否定性思维。“机智的反思则是抓到矛盾、表达矛盾的。的确，机智的反思虽然没有表现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而且只以表象的规定作为自己的材料和内容，可是它毕竟将事物置于那包含着事物的矛盾的相互关系中，从而使事物的概念通过矛盾透露出来。”^④黑格尔又把这种思维称之为“否定性思维”，即思维通过扬弃外在反思的直接性，透过表象而进入本质。因此，这种思维开始把否定性带入到原有的直接同一性之中，于同一中看到了对立，在肯定中看到了否定，这是其高于外在反思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之所在。但是，他还不理解这种矛盾，甚至把这种矛盾看作是一个不可克服的两难困境，因而陷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之中。黑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芝诺和康德对于“矛盾”的否定性论证，就属于这种“机智的反思”的范畴。黑格尔肯定芝诺的辩证法“掌握了我们空间和时间观念所包含的诸规定；他曾经把它们（即时空的诸规定）提到意识前面，并且在意识里揭露出它们的矛盾”，然而他却得出了否定这种矛盾的结论；而“康德的‘理性矛盾’比起芝诺这里所业已完成的并没有超出多远”^⑤。

再次是理性的反思，即在进一步扬弃“机智的反思”基础上将矛盾的对立面内在统一起来的辩证思维。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种“思维的理性，可以说是使有差别的东西的钝化了的差别尖锐化，使它们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这样，达到矛盾尖锐化的多样的东西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动的和活生生的，并且才能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即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的搏动”^⑥。这种思维的特点，一是将抽象的差别深化为本质的差别即具体的差别，从而达到矛盾对立；二是在事物本质自身的内在矛盾性中“获得否定性”，而这种否定同时是一种自我扬弃和自我回归，并且成为事物“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搏动”的源泉和动力。至此，反思才达到了“思维的理性”或“理性的思维”的高度。

一般认为黑格尔对反思的这种反思过于抽象，使常人的理智难以理解。但如果将其应用到中国近

代人们精神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上面，那就生动鲜活且恰如其分。因为这一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的过程正好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外在或感性的反思阶段。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整个社会——上至朝廷下至庶民百姓，都沉浸在“华夏至上”“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林则徐在战前乃至战中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曾说：“夷兵腿足裹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可用竹竿将其钩倒”；还说：“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可制其死命。”^⑦直到真正打了败仗，而且败得十分难堪之后（7000西洋兵打败了一个帝国），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因而感慨清军“器不良”、“技不熟”，无法与西方海军对抗。这一残酷事实使他深切感到必须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他主持节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和历史情况。尔后，又委托好友魏源在《国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更加详备的《海国图志》。该书在“序”中就明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⑧无疑，这种认识相对于过去的愚昧无知是一种进步，开始承认了自己的落后。但这种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它只看到了西方物质层面的先进性。借用黑格尔的说法，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外在的反思”。

二是知性或机智的反思阶段。这以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洋务运动（1861年—1894年）为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朝廷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决意向西方学习，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在朝中重臣奕訢、文祥和地方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倡导和组织下，开始了以学西器、西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故又称自强运动。

在理论上，洋务运动的基本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他在其《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⑨。后来早期维新派人物郑观应也说过：“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⑩这里的所谓中学，主要指君主专制的基本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西学是特指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办报、译书、学校、变科举等诸事。前者作为“本”是不能变的，后者作为“用”是可以权变的。对此，张之洞所作《劝学篇》专门对“中体西用”作

了系统的论证。

张之洞承认遇此“千古未有之变局”，欲变法未尝不可，问题是变什么？如何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则“法未行而大乱作矣”。他所谓不能变者，道之本也，即三纲五常之类；可变者，器也，工艺器械之类。他明确地指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妇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⑩张之洞的这个观点也是当时朝廷的观点，因而受到清政府的高度赞扬。

应该说，洋务派的思想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仅仅只认识到西方外在器物先进的观念是一个进步，它开始提出了变革中“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的矛盾，但却未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之中不能自拔。

三是理性或思维的反思阶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他们如大梦惊醒，深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还只有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那么，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才开始产生了普遍的民族觉醒意识。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⑪

维新派与洋务派的不同：一是提出全面变法的主张，不仅要变器，而且要变道。他们尖锐地驳斥“中体西用”的观点，指出这种把体用对立起来的做法如同“以牛为体，以马为用”^⑫一样荒谬。二是明确提出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维新派想通过朝廷自身实行自我变革的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于是，形势的发展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革命派的基本观点是：清政府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局部的修补是无济无事的，必须予以推翻^⑬；运用自上而下的“和平方法”已“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⑭，即须以革命的方式来达致目的。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辛亥革命在历史的必然和偶然的交错中爆发了，延续了2000多年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于宣告结束。

从精神反思的逻辑来看，进入理性反思阶段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已经在认识上把原来被人为分割的道与器、体与用、本与末重新统一起来了，但是，精神的运行最终要达到自我认识，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对观念、精神自身的自我反思。这是思之思，即对思想本身进行思想，或者说对精神本身进行反思。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军阀割据的矛盾进程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以往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乃是因为中国国民的冷漠和愚昧，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来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这个运动始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是该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该杂志的宗旨是：“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后来解释道，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清除旧思想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是由于在中国，“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若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⑮。

基于这种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喊出了“破除迷信”“求得思想的解放”的口号，高举“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这两面大旗，提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作为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

其实，文化精神的自我反省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于1899年发表的文章《中国魂安在乎》。在该文中，他首次提出了“中国魂”的概念。“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⑯

进入20世纪，“重铸国魂”的讨论成为一个时代话题，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到“国魂”“国民性”“立国精神”“中国文化精神”“国民之元气”等问题的讨论当中。清末怪杰辜鸿铭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通过将中国人与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比较，揭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价值。他把中国

人的性格和中华民族的特质概括为“深沉、博大、淳朴、灵敏”。

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而且力图以民主和科学为参照，构建新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李大钊就曾明确指出：“我认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们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⑧

总之，纵观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道德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深刻的国民性批判等，大大深化了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解。但勿庸讳言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因矫枉过正，也出现了一股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如胡适提出“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时代的文化”“罪孽深重”，因而必须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实现充分西方化、世界化（他后来用“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即充分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鲁迅也一度持这种观点，提出线装书最好一本不看。这些都是过激之论，并不代表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并不代表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全部思想（从胡适后来的文章和演讲来看，他提出“整理国故”，并未完全抛弃传统文化）。

由上可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中国人民精神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经历了从外在反思，经过知性的反思，最终达到理性的反思的过程，而理性的反思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回归到精神和观念本身，即从人的本质世界的最深处——内在精神世界中寻找一切现实问题的终极根源，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与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精神运演的曲折行程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但在一个东方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注定要走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曲折之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探索之路，又无情地以压缩的形式重演了中国近代史上精神发展的痛苦进程。从逻辑演进的过程看，它似乎也以近乎宿命的形式经历了反思的三个阶段。

首先是外在的反思。在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之前，由于长期实行封闭和半封闭的对外政策，国民对西方世界也几近无知。只是在开放的大门打开之后，我们才睁眼看清了外面的世界，终于认识到

已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实。于是，我们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个阶段相当于外在的或者感性的反思阶段。

其次是知性的反思。这个阶段约始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十三大报告有诸多突破。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开始超越了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维框架^⑨，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统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有机结合的改革思路^⑩。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的十六大则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的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以进一步强化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对于整个改革的判断上，继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⑪。由于这个阶段的认识已经超越物质技术的层面，深入到了体制变革这个深层的本质，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定位于知性的反思。

再次是理性的反思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部分独立出来，并将其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

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②。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第一次把“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作为其重要内容。

在此基础上，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更加简明扼要和便于传播践行的12个词、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在当今时代的集中体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精神”。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③2015年1月19日，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把中国精神教育纳入其中，要求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加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中共党史与国情教育。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当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等这一连串“精神名片”在中国政治和理论舞台上陆续出场时，它所标示的实质上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其精神的自我回归和自我觉醒。

从一部苦难的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出，民族精神的自我觉醒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有反复、曲折、彷徨、蹉跎，其运行必然会遵循辩证发展的逻辑，这

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三、我们需要中国精神的理由和根据

我们何以需要中国精神？概而言之，其理由和根据有如下几点：

第一，它是精神发展的逻辑必然，而非主观的凭空构建。当我们问“何以需要中国精神”时，并非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华民族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客观规律或逻辑必然。这不是你想不想要、愿不愿要的问题。不管你主观上愿意与否、喜恶也罢，精神都会遵循其内在的客观逻辑，从那盲目的自在的“实体性原则”中解脱出来，通过自我反思达到自觉自为的觉醒。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顺应这一历史的逻辑，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当代实现即时代精神的承担者和践行者。

精神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累加的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传统的民族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也并非“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④。精神的发展遵循着矛盾的法则。当旧的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内在堕性力量日益增长，终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隔绝了与外界的信息和能量交流，特别是阻断了对外界挑战的积极回应。于是，精神在盲目的自满自足中走向衰败。一当外在的新的力量在必然和偶然的机缘中从天而降，并突破坚硬的外壳，深入到其内在本质时，原来陈旧的僵死的精神结构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发生剧烈的嬗变，从而在精神的重构中形成新的民族精神。

因此，精神的嬗变和重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总的来说，它是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必然和偶然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外在挑战的激发和催化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历史主体能动的选择和变革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自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华民族近200年艰难求索的历史进程，其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日益得以成长壮大，成为支配着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欲深入理解中国精神及其建构的重要意义，首先就需要懂得其内在运演的时代逻辑，然后

将其放置于这一历史的逻辑中去加以解读，才能深刻地认识其生成和建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二，它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而非历史的外在力量。一般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在人们心理中的反映和表征，其作用不过是反过来从外面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罢了。长期以来，我们把这种观点看作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实际上，这种解释有违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耦合互动的有机系统，其中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要素之间与要素之间彼此既交互作用又相互渗透，形成高度复杂且无穷无尽地变动发展的开放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每一个要素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要素处于“全息”式的交合之中，同时又“全息”式地反映其他要素和整个系统的特性。因此，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脱离其他要素而单独运行。

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从解剖市民社会入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次，并具体分析贯穿其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本质规律。但如果我们深入剖析两对基本矛盾的内在关系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相互交融的，生产力中既包含了生产关系，也包含了上层建筑，那种认为生产力离开上层建筑也可以独立运行、上层建筑只是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才能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意的。

除此之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在自然界，主要起作用的是那些原生的有机或无机的物质，这些物质也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之中，但这一切“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⑤。至于自然界的生物，它们仍然局限在自然进化所预先规定好的范围内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可能反过来改造自然界，创造自然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但自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后，这种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能进行生产劳动，通过改造自然界而获取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

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是以精神智慧为前提的。人类的精神智慧没有进化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制造出哪怕是一把最粗糙的石斧或石刀的，更不可能从事更为复杂的生产劳动。然而，人类的精神智慧又不是从天而落的，而是在人类漫长的劳动实践中逐步积淀而成的，二者很难在时间上区分谁先谁后。因此，可以说，人类因生产劳动使自己终于告别了自然界，也同样因具有超越于动物的精神智慧而成就了“人猿相揖别”。

若从这个维度来观照人类历史的话，精神同样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当我们说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时，也就自然地肯定了精神智慧的动力作用，因为物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精神智慧的产物。同时，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物，不仅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是由人的精神理性来支配的、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力是由思想和精神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且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也是由特定的“民族精神”推动的。黑格尔曾指出：“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些特殊的特质要从那个共同的特质——即一个民族特殊的原则来了解，就像反过来要从历史上记载的事实细节来找出那种特殊性共同的东西一样。”^⑥尽管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关于特殊精神原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内在灵魂的思想则具有其合理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⑦

然而，过去我们对此研究不够。但自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特别是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之后，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内在灵魂和根本命脉，是推动社会发展强大精神动力的观点已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中，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精神又

被重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第三，它是当今中国时代发展的亟需，而非一时的应景之作。列宁曾指出：“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²⁸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新时代，其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如果说在改革的前期其着力点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话，那么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就一个社会系统来说，其作为“硬核”的“深水区”在哪里呢？根据文化哲学的观点，社会从内至外包含三个层面，最里面的一层是“精神”，即文化的认知和价值理念，中间的一层是制度文化，最外面的一层是物质文化；无论制度文化还是物质文化，都是作为精神文化的外化或对象化。我国改革所遵循的是由浅入深、从易至难的原则，即首先从物质领域开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变革，继而对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而最终将走向历史的深处——观念和价值的内核。这就是为什么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文化建设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的深层原因。

纵观中外历史，凡属重大的社会变革，思想和观念的解放必然充当开路先锋。我国的改革就是如此。1978年年中所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启发挥了理论先导的作用。这之后，在改革的每一个历史节点上，思想观念的创新都扮演了重要的引领角色。

当改革进入到一定阶段特别是抵达核心领域时，在观念变革中的精神重建本身将成为改革的任务和目的。在这里，思想的嬗变和精神的觉醒与精神的回归和重建将在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真正内在统一起来。从思想精神的解放开始，最终归于精神自身的构建，这是一条精神的自我反思、自我发展之路，也是一个社会改革和建设所必经的时代逻辑。

注释：

-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
- ②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6—597页。
- ③④⑥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8、148—149、149页。

⑤⑭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3、8页。

⑦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

⑧ [清]魏源：《海国图志》（上），岳麓书社1998年版，《海国图志原叙》第1页。

⑨ 熊月之编：《冯桂芬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

⑩ 《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⑪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⑫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⑬ 《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⑭⑮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52页。

⑯ 《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⑰ 《梁启超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⑱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页。

⑲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461—462页。

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54页。

㉒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㉓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㉔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㉕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4—105页。

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页。

㉗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作者简介：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常晨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胡静）